

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上)

核心提示

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民党称蒋介石为“中国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千古完人”。

中共方面,即使是领袖毛泽东,不同时期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天差地远。如1938年10月,中共延安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到了1945年,毛泽东则以“新华社发言人”身份宣布蒋介石是“人民公敌”。

要写出科学、准确、全面的中国近代史,一定要给蒋介石、国民党一个正确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一起。

重庆谈判时
想拘留、审判毛泽东

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一直记到1972年,共57年,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不但有利于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也披露了许多政坛内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是,最初决定以“诚恳、忍耐”四字方针对待毛泽东。毛泽东赴渝后,表示中共要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承认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地位。这两条蒋介石当时看得很舒服、很高兴。随着毛泽东提出其他一些条件,蒋介石很生气,于是把先前确定的四字接待方针改为“拘留、审判”。蒋介石想借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机会把他扣下来,然后付诸法律审判。当初是因为美国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才去重庆的,斯大林也连续发了几封电报给毛泽东,让一定要去。若把毛泽东扣了,蒋介石估计会出现两种可能:苏军当时占领了中国东北,有可能拒绝撤兵;另外苏军可能占领新疆,进攻中国的西北。反复权衡后,蒋介石还是感到不踏实,于是决定了新的四字方针。首先是“授勋”,他决定给毛泽东授一枚抗战胜利的勋章;第二是“礼送”,派张治中为代表,彬彬有礼地用飞机把毛泽东送回延安。

日记里骂宋美龄和孔令侃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蒋介石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作秀。蒋介石喜欢骂人,在日记里大量记载了他骂人的话。如孙中山先生的少爷孙科,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是“阿斗”,说孙科这个人不仅卖党,而且卖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在日记里骂孔祥熙是“无耻之尤”;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小舅子,蒋介石在日记里说宋子文这个人嚣张跋扈,绝不可用。

1972年,病中的蒋介石在日记里连续好几天都写了这样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蒋介石这是在骂宋美龄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原来尼克松上台后,立马派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随即亲自访华。为什么尼克松突然变得对中共友好了?思前想后,蒋介石认为,原因就在于自己当初没给尼克松竞选经费,以致对方记恨自己,而这正是当初宋美龄和孔令侃的主张,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骂他们两个人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色戒:连这点儿欲望都克服不了,和一条狗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个人隐私。他早年有三重身份: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儒学的信徒;上海洋场的花花公子,搞三陪、逛妓院,这些蒋介石都干过。但蒋介石说他要做中华民国的模范,要当古往今来第一号的圣贤豪杰,于是他下决心要跟自己荒唐、好色的毛病作斗争。蒋介石年轻时,在街上看见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当天晚上,他就在日记里写上“见艳心动”4个字,后面还有“记大过一次”5个字。

蒋介石曾受孙中山的委派,在福建

南部打仗,偶尔回上海看看。那时从福建南部回上海,一定要先到香港换船,蒋介石去香港之前会写一段日记,说“香港是一个花花世界,我蒋介石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就看今天了”,以此勉励自己改正好色这一毛病,后来又写“我又犯错误了”,他说自己每天都读曾国藩的书,连这点儿小小的欲望都克服不了,还算人吗,和一条狗有什么两样?能将这些隐私写进日记,也反映出蒋介石的日记有较大可靠性。

1923年在莫斯科差点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早年很激进,他有一段日记说中国的问题不在军阀,不在官僚,而在资本家。把资本家全杀光,中国就有希望了。

后来蒋介石变了。1923年,蒋介石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讲,中国革命不仅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没收本国资本家的财产。当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民主革命,要把外国的财产、外国的工厂、中国资本家的财产统统没收,这是极“左”的思想。蒋介石当场跟共产国际的领导顶起来,强调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步才能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当年在莫斯科有一个中共代表团,觉得蒋介石还不错,于是跟蒋介石谈话,要发展蒋介石当共产党员。蒋介石想了想,拒绝了。他就一条理由:我是国民党员,让我加入共产党事关重大,这要请示孙中山先生。最终蒋介石没有在莫斯科加入中共。

后来,蒋介石和中共的矛盾逐渐增加,矛盾之一是领导权之争。蒋介石表示

中国革命要国民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革命要由中共来领导。领导权只有一个,两个党都要领导权,怎么办?蒋介石最初是找共产国际。1926年下半年,蒋介石把他自己身边的秘书、中共创党时期的党员邵力子派到莫斯科,传达他的3个要求:世界革命必须由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国民党要求参加共产国际。

对于第一个要求,斯大林听起来当然是心花怒放,世界革命要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谁领导?就是苏联共产党领导,当然就是斯大林领导。“中国革命要由国民党领导”,斯大林不赞成,但他没有立即反对,后来通过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决议,说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当然是中共领导。“国民党要参加共产国际”这个要求把斯大林难住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参加共产国际算咋回事?于是,斯大林又通过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决议,让国民党当共产国际的观察员。后来邵力子有一段时间就在莫斯科,当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观察员。

拒绝交出中国战区指挥权,把史迪威赶回美国

美国在“二战”中是中国的盟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中国很大援助,但双方在1944年发生矛盾。按照罗斯福的意图,此前成立了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战场、越南战场、泰国战场、缅甸战场,统帅是蒋介石。罗斯福给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长——后来的四星上将史迪威。当年,由于中国战场国民党军队打得不好,罗斯福让蒋介石把指挥全部中国军队和全部中国战区的权力交给参谋长史迪威。蒋介石认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不能交。蒋介石告诉罗斯福,中国的国情复杂,权可以交,但要慢慢地交。罗斯福看出蒋介石

是想拖、想磨,于是给蒋介石下通牒,想迫使他交出权力,否则休想从美国人手上再拿到一分钱的援助。

蒋介石采取了两项对策,首先是准备跟美国绝交;另外,蒋介石以攻为守,对罗斯福说,自己不喜欢史迪威这个人,请把他召回美国去。罗斯福当然觉得这很没面子,权衡再三,觉得不能没有中国这个战友,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他回复蒋介石:不要史迪威可以,美国的将军很多,你从我们美国将军里挑三个,我来圈定一个。最后,蒋介石从美国将军里挑了三个,罗斯福定了一个人叫魏德迈。

反攻大陆拒绝苏联援助
不能当吴三桂、洪承畴

1923年,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莫斯科,见到了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蒋介石向托洛茨基要求,苏联方面同意在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建立国民党的军事基地。开办一所军官学堂,训练一支军队,然后从蒙古出发,进攻当时北洋军阀的首都——北京,曹锟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是广州,但广州旁边的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的军队从广州北伐,英国随时可以在广州捣乱,令“后院失火”。从广州北伐要经过广东、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六个省,要跨过长江、黄河,帝国主义的军舰可以从上海一直开到武昌的江面,把北伐军拦腰斩成两段,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认为广州不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库伦离北京很近,出了蒙古就是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就等于到了北京,中间没有高山峻岭,没有大江大河,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把军事基地选择在蒙古的库伦。

当时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红军就驻扎在库伦。苏联方面一直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当蒋介石向托洛茨基提出这个要求时,托洛茨基说,国民党的脚不可以踏上蒙古的土地,你们要进攻北京,只能从蒙古的边境上起兵。蒋介石的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求人不如求己”,有的人别开口头讲得很好,是同志、是盟友,但是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就是在1923年,蒋介石看出了苏联领导人有人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这是蒋介石后来反苏的原因之一。

1968年,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原来蒋介石撤退到台湾以后,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不甘心失败。但台湾地方小、军队少,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蒋介石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蒋介石希望美国人出钱、出先进武器来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久而久之,蒋介石发现美国人没有这个意图。蒋介石由此悟出一个道理:美国人并不想帮助国民党反攻,美国人是想把国民党当成一条看门狗,帮助美国看守西太平洋。

就在蒋介石对美国援助失望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坏到了极点。恰好这个时候,苏联派了一个名叫维克多·路易斯的人找到蒋经国说:“你们不是想反攻大陆吗?要是缺钱的话,苏联可以给钱。缺武器呢?开张清单来,你们想不想利用苏联在中国边境的那些基地呀?尽管提出来。”

双方开始商谈,蒋介石最初很高兴,但到了1969年,蒋介石想来想去,觉得不能接受苏联的援助。他在日记里说,苏联援助国民党,一定是想乘机侵略中国,可要记住吴三桂和洪承畴的教训,不能够重蹈他们的覆辙。

1969年下半年,苏联在中国北方边界屯兵百万,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要准备跟苏联打仗,苏联随时有可能从北方进攻中国。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又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我决不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我在这个时候反攻大陆,苏联就可能趁机侵略华北。”

以上不难看出,尽管蒋介石和中共势不两立,做梦也想反攻大陆,但是他仍不愿意给苏联人提供可乘之机。(据《文史参考》)

本文内容由杨天石主讲,刘火雄整理。

杨天石,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以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孙中山、蒋介石等民国人物见长,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等。

